

古吴履印文丛

# 吴史漫考

张志新 著

吴文化之所以能发展起来，有着特定的条件，『太伯奔吴』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等等；而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、当地土著民族所创造的灿烂的原始文化，则应该是吴文化赖以诞生、发展的土壤。

古吴轩出版社

# 吴史漫考



张志新,1948年生,祖籍江苏武进。1950年随父母来到苏州。1973年开始从事文物、考古工作,曾任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,吴县政协文史办副主任,江苏省考古学会理事,中国民族建筑学会会员。期间在《文物》、《考古》、《文物资料丛刊》、《苏州大学学报》、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发表过论文多篇;并参编过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·江苏卷》、《江苏文物综录》、《江苏省文物志》;主编过《吴县文物精华》、《吴县文物》。1988年,因工作需要调到经济部门。现任苏州市天翔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。考古、文史研究和写作成为其业余爱好,至今笔耕不已。

# 序

邹厚本

记得1973年,从江苏各地抽调30余名刚踏上文博岗位的年轻人到南京博物院学习文物考古,志新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当时还挺正规,课堂讲授新编教材,野外实习在南京附近江宁点将台、湖熟遗址及吉山铁矿南朝墓地。学习结束后,这批年轻人被各地视为新生力量,弥补了“文革”期间我省文博界人才缺失的断层,其中不少人至今仍承担着各地文博事业的重任。

当时张志新给我的印象是勤奋好学,悟性极高,知识面宽,待人热情,谈吐稳重,似乎少有一般年轻人的“冲劲”,后来得知这与他的家庭背景、文化素养以及下乡插队社会实践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志新回单位不久,即挑起了业务重担,并逐渐主持起吴县文管会的工作。吴县是江苏考古的重点地域,经常会有重要的考古发现。由于工作关系,我与志新的业务联系、接触很多。共同商量、策划过吴县境内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,譬如:吴县澄湖古井群,龙桥大龙江古井群,西津桥何山、狮子山,甬直张陵山晋墓以及苏州市西南山区石室土墩调查,为此翻遍了吴县的大小山头。除了工作中的频繁接触,我们还经常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探讨,例如:石室土墩的性质问题,张陵山是否张苍墓地问题等等。互相沟通启发,气味相投,使我们从师生关系变成朋友关系,至今时常还会对有些问题议论一番,例如: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发现,及其对石室土墩定性的佐证问题等等。看来,我们之间的考古情缘还在继续。

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,一种是用心去做事,事毕有得;另一种是机械式做事,完成即了。志新显然是前一种,《吴史漫考》是最好的见证。

今天,我们看到的《吴史漫考》,它的内容分类十分明确,一类是考古与历史;一类是近乎历史地理考订;一类是考古发掘原汁原味的资料,这些文章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,基本上属于历史与文化范畴。这些文章有的是他早年的体会和认识,有的则是新的认识和观点,有旧有新,融会一体,代表了他在学术上曾经有过的探索与足迹,工作总结和纪念,是人生经历中的一笔财富。

志新从事文物考古的十余年间,与同事们一起为吴地的文物保护、考古工作做了不少事,征集到一批国宝级文物,成绩斐然。《吴史漫考》中所论述的大多是他亲自经历调查中所见所闻的思考和心得。随后的岁月,尽管他离开了文博界,环境已变更,角色已转换,然而他对文物考古的痴迷与钟爱始终没有改变,这里不少文章就是在其致力于企业经营发展时期撰写的。

我相信《吴史漫考》的出版,不仅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新鲜的知识,而且对吴地历史掌故感兴趣的读者,还可能会对本书中的观点提出讨论,毕竟其中有些观点用志新自己的话来说,“只是抛砖引玉”而已。

由于我与志新有三十余年师生情谊,他要我为《吴史漫考》写个序,考虑再三,写上这些,夹叙夹议,算是序吧!

2006年7月于南京博物院

# 目 录

## 吴史漫考

- 从张陵山遗址看吴前文化的渊薮 /003
- 苏州的良渚遗存及古代文明 /016
- 良渚古井遗存及其文化特色 /027
- 澄湖形成的原因和年代问题 /034
- 我们对山顶石室建筑的初步看法 /040
- 太湖地区“石室墓葬说”质疑 /049
  - 关于“吴为周裔”说 /055
  - 太伯立国与吴国世系 /057
  - 季札和“三以天下让” /060
  - 季札,吴国的礼义君子 /063
    - 丹徒母子墩吴墓 /066
    - 王僚,乱制以遭杀身 /068
    - 虎丘剑池与阖闾冢 /070
  - 吴国的两位仲尼弟子 /073
  - 吴国开凿的三条运河 /075
  - 吴楚征战,导源于楚晋争长 /077
- “楚叔之孙盍”与吴楚争霸战争 /079
- 夫椒之战:吴国的自卫反击战 /081
  - “夫椒山”究竟在哪里? /083

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吴越不尚车战 /085        |
| 吴越的舟楫 /087         |
| 吴越的戈与剑 /090        |
| 吴王夫差矛 /093         |
| 越王勾践剑 /095         |
| 是谁完成了吴国的春秋霸业? /097 |
| 吴王夫差其人其志 /099      |
| 伍子胥,出于忠臣世家 /102    |
| 伍子胥与太宰嚭 /104       |
| 越国的强国富民政策 /107     |
| 勾践,励精图治的君王 /109    |
| 子贡的吴越齐晋四国之行 /112   |
| 范蠡的治国之道 /114       |
| 吴国的“长城” /116       |
| 上方山上的土墩石室 /120     |
| 吴城·越城·越来溪 /123     |
| 姑苏台址在哪里? /125      |
| “干遂”地望考 /128       |
| 吴国的墓葬 /131         |
| 苏州真山“吴王陵” /134     |
| 范蠡处世,明进知退 /137     |
| 范蠡最终去了何方? /139     |
| 西施归宿钩沉 /141        |
| 吴越的货币 /144         |
| 无锡鸿山发现的越国贵族墓 /147  |
| 绍兴的吴越历史遗存 /149     |
| 严山玉器窖藏与越国灭吴战争 /151 |
| 太湖流域的晋代墓葬 /158     |

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

——兼与赵鸣等同志商榷 /167

元末《郑国公墓志铭》简述 /176

明清时代洞庭东山的物产和东山人所经营的商业 /180

读王鏊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》

——兼谈明代洞庭山人从商的原因 /190

### 孙武研究

孙武在吴著就《兵法》/197

孙武在吴著就《兵法》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/199

对认定孙武隐居穹窿山观点的附议 /204

孙武弃政缘由析 /213

### 发掘简报

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 /219

江苏吴县出土新石器时代稻谷 /235

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 /236

吴县通安严山出土玉器及几个相关的问题 /240

江苏吴县窑墩汉墓 /254

吴县通安古井清理简报 /256

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 /260

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 /268

### 后记 /275

# 吴史漫考







## 从张陵山遗址看吴前文化的渊薮

吴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,她是文明时代的文化,这是举世公认的。

吴文化之所以能发展起来,有着特定的条件,“太伯奔吴”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等等;而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、当地土著民族所创造的灿烂的原始文化,则应该是吴文化赖以诞生、发展的土壤。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说的:“文明是由‘野蛮’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。现今考古学文献中,多使用‘新石器革命’(neolithic revolution)一词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。经过了‘革命’,人类不再像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的人那样,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,靠天吃饭,这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次大跃进,而为后来的文明诞生创造了条件。”<sup>①</sup>因此,研究吴文化,有必要从研究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,这样才能使吴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。本文以张陵山遗址为实例,着重探讨太湖地区吴文化确立之前的社会文化形态,请允许我称之为吴前文化。

### —

张陵山,位于吴县角直镇南2公里处,与澄湖古文化遗址隔澄湖而相望;而与唯亭草鞋山遗址也相距不远。张陵山分东西两陵,山虽不高,却使河港纵横、湖泊甚多的水网地区增色不少。张陵山所在的角直镇,有吴宫乡之别称,陵北有阖闾浦蜿蜒而过,邻近张陵跨浦而过的阖塘桥上,有“鹰齿远吞三迎白,龙门高

注:① 夏鼐:《中国文明的起源》,《文物》1985年第8期。

锁两峰青”的桥联,生动地概括了张陵山、澄湖、阖闾浦这一地段的形胜,加之当地还有“梧桐秋,吴宫愁”之谚,附丽着许多春秋吴越时代的动人故事,给张陵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张陵山遗址,是1956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文物调查时发现的,1957年经过复查,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遗址分东西两陵,面积各为6000平方米左右,陵顶部高出地面约6米。“文革”后期,由于当地砖瓦厂不断取土,陆续出土了玉镯、玉钺、穿孔石斧、石铤、石刀及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陶器等遗物。1977年5月南京博物院和吴县文管会对西陵进行了发掘,计开掘探方7个,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11座,出土文物211件。1982年8月和1984年6月又先后两次对东陵进行发掘,开掘探方6个,清理墓葬4座,出土遗物30余件。通过发掘,弄清了张陵山西陵的文化堆积层厚达8.4米,东陵为6.4米。西陵的文化层可分表土、黄褐土、青胶土、灰黄杂色土等四层,含碳量较高的青胶土层厚1—1.5米,基本不含文化遗物,11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及大部分文物,都分别发现于第二和第四文化层。东陵的文化层也可分四层,土色与西陵略有不同,分别为表土、红褐土、灰褐土和灰土。第二层出土曲折纹、回纹组合的拍印纹硬陶,并有墓葬一座,出土物属西周中期遗物,是应为吴文化遗物。第三层的遗物具有典型良渚文化的特征。第四层遗物的特征与西陵第四层相接近,为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的遗物(详见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6辑:《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报告》;1986年第10期《文物》:《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》)。通过发掘,弄清了张陵山遗址吴文化层、良渚文化层、张陵山文化层和崧泽文化层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。同时发现了一批典型墓葬和典型遗物。

### (一) 典型墓葬

张陵山下层共清理出属于崧泽文化期的墓葬8座,西陵下层编号为M1—M6;东陵下层墓为M07—M08。从发掘现场看,这一时期的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,有木质葬具痕迹,头向南偏东,各墓随葬有数量不等的陶器、石器和玉器。最少的1件,最多的31件。常见的陶器有鼎、豆、碗、盘、三足钵、盆、罐、四系罐、杯、缸、瓮等;石器主要有穿孔石斧和石铤;玉器有玉钺以及镯、环、管、珠、坠等饰品。其中M05号墓比较典型。

M05位于五号探方的南部,距地表深6米。骨骼已朽,但仍可辨出为单人仰身直肢葬。有清晰的葬具痕,宽约0.85米,骨架表面满布一层朱红色物质。随葬品31件,其中陶器12件:有豆、盘、缸、瓮、罐、杯、盖等,几乎全部放置在足端。5件大陶缸和1件大陶瓮集中放置,这样的现象以往很少见。穿孔石斧3件,分置于左右手及腿部,石铤2件置于左肩及左腹部。玉饰品14件,其中环、珠、坠等发现于左上臂外侧,玉镯1件在右手腕部。

西陵第二层发掘出属于张陵山文化期的古墓5座,编号为M1—M5,其中M1—M3规模较小,骨骼朽烂,可辨其头为南向,随葬品较少,只有陶器4至7件。M4—M5的葬式比较特殊,随葬品也比较丰富。

M4位于五号探方的东部,深2.7米,墓圻不明显,根据土色的差别,约略可以看出墓宽1.75米左右,墓底有朽烂的葬具痕迹,由南北向的长条形木板组成,长约2.8米、宽0.85米。此墓遗骸腐朽较剧,墓的南部发现一些零星的人肢骨,中部和北部发现3个人头骨,其中西北角上的一个保存较好,顶骨向上,值得注意。该墓出土随葬品共41件,其中陶器17件,有鼎、豆、瓮、罐、盆、盘、杯等;石器8件,有穿孔石斧,有肩穿孔石斧和双孔石斧;玉器16件,有蝉、琮、环、瑗、管、坠,还有垂幃形佩饰、有孔碧玉钺、筒形玉镯等。

M5位于五号探方西部,深3.2米,墓圻不明,骨殖已朽,墓南部发现一个人的头骨和部分肋骨残渣,可辨明头为南向。墓的北部发现2个残人头骨和一堆上下肢骨,可以认为这是2个人的迁葬遗骸。随葬品46件,其中陶器13件,有鼎、豆、钵、罐、缸、匜、碗、贯耳壶、器盖等,分布在墓的北端和中部;石器15件,有穿孔石斧12件,有肩穿孔石斧和石铤等,大部分放置在墓的南端;玉器18件,有坠、管、珠、觿、璜等,大部分出自墓的北部。

东陵第三层发现良渚文化墓1座,该墓人骨及葬式均不明晰,出土遗物有黑衣陶盆、钵等一组,石铤1件,玉器19件,其中璧4件,琮2件,玉钺1件,还有玉圆片、镯、环、镂孔杖头、纺轮、珠、锥形饰件等等。

东陵第二层清理出吴文化墓葬1座,系覆土埋葬,人骨无存,遗物有硬陶器4件,原始青瓷器5件,器型有甗、罐、豆等。

## (二)出土典型遗物



张陵山古墓群发掘中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石器、陶器和玉器三类：

### (1) 石器

发掘中共出土石器 35 件,其中穿孔石斧 31 件,占总数的 88.6%,是张陵山遗址出土石器的一大特点。在这些穿孔石斧中,有 6 件是以硬度较大的火成岩磨制,圆角弧刃,形体浑厚,中部偏上钻一圆孔,出土时都带有使用痕迹,为实用工具。这类石斧上、下文化层均有出土。另一类穿孔石斧,则以角页岩或板岩制成,形体十分扁薄,方形弧刃,中部以管钻法两面对钻成孔,似为铲、钺状,琢磨精细,器表光亮如镜,出土时大部分没有作为砍砸器使用而留下的痕迹。这类石斧在属于崧泽文化期的下层墓中仅出土 6 件,而属于张陵山文化的上层墓中出土 19 件,数量明显增多。在上层墓中出土的穿孔石斧中,还有 3 件上端裁割琢磨出一对窄肩的,形体更似钺的和 1 件镞有双孔的,都制作得格外精细。此外还有石镞 4 件。

### (2) 陶器

东西陵发掘中共出土陶器 112 件。除鼎、匚、缸及少数罐为夹砂褐色陶外,其余主要为泥质灰陶和泥质黑衣陶。常见的纹饰有粗细不等的弦纹,附加堆纹和镂孔。部分陶器上带有朱红色和黄色彩绘,彩色是在陶器烧成后绘上去的,附着不很牢固,和一般的彩陶不同。陶器制作都较匀称,从器表带有的密集而整齐的弦纹来看,当时制陶工艺已普遍使用轮制技术。器型有:鼎、豆、碗、盘、钵、盆、匚、杯、壶、罐、瓮、缸等。其中鼎、豆、杯和罐所占的比例为多。

鼎,14 件,折沿,浅盆式,下带三宽扁形或凿形足,张陵山文化期墓葬中出土的,则以鱼鳍形足为多。其中 1 件带桥形钮覆盘形盖;1 件在口沿侧附加一鋈。

豆,13 件。所谓豆是古代的一种盛器,类似现在的高足盘,侈口浅盘,矮圈足居多,少部分为喇叭形圈足,纹饰也较简单,素面或弦纹居多,有些则饰有三角形和圆形镂孔组成的花纹。

杯,15 件,出自东陵下层墓的 1 件,直口,筒腹,平底略内凹;出自西陵的 14 件中,有些外表饰有弦纹,2 件分别饰朱红和红黄相间的宽带彩绘,平底内微凹者居多,有 2 件底部边缘作葵瓣状,稳固而美观。

罐,21 件。1 件出自东陵下层墓,小口,卷沿,圆肩,鼓腹,平底,器表打磨光



滑,腹部饰有平行的凸棱和附加堆纹各一周,器形较大。西陵出土的形式较多,1件圆肩长腹,矮圈足,腹部饰4道凸弦纹;另1件小口,斜颈、折腹,小圈足;肩颈部、腹部和圈足部饰有3道朱红宽带纹,比较典型。还有夹砂红陶质、腹部满饰弦纹的带把罐1件和肩部饰弦纹、并带有4个小系的小口平底罐2件。

以上陶器,主要出自西陵墓葬。下层墓出土的器物,明显带有崧泽文化期器物的特色。而上层墓出土的器物,比典型良渚文化期的器物胎壁厚重,以泥质灰陶为主,陶器表面带黑衣的,也不似典型良渚黑衣陶那么黝黑光亮;器表的纹饰以附加堆纹和镂刻纹饰为主,不似良渚时期所饰弦纹那么精正,表现出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期的特色。

在东陵第二层墓内,则出土有几何印纹硬陶器4件和原始青瓷器5件。这些器物烧造温度较高,质地坚硬。器型有甗、罐、豆等,表现了吴文化时期陶器的特点。

### (3) 玉器

成批玉器的出土是张陵山遗址发掘中的又一大特色,发掘中共出土玉器77件。经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鉴定,这些玉器“属透闪石——阳起石系列软玉,没有蚀变的玉器颜色呈青绿色,比重在2.74至3.2间,硬度大于5度;经过蚀变的玉器颜色多灰白色,比重2至2.5,硬度也小于5度”。<sup>①</sup>出土物中还有少数为蛇纹石和玛瑙。西陵出土的玉器有:玉琮,1件。圆筒形,似镯,但孔径甚大,不宜佩戴。外壁用减地法突出4块对称的长方形凸面,凸面上阴线刻画出兽面形图案,粗眉圆眼,阔口獠牙,威严而生动,可能为后世饕餮纹之滥觞。清末吴大澂《古玉图考》中收录玉琮33件,其中2件“组琮”的形制与此相同,但凸面上未加刻纹,此件更为精致。

另有玉镯8件,玉璜1件,玉环5件,玉管10件,玉坠23件,玉珠3件,幢形玉饰1件,玉蛙1件,玉瑗2件,玉觿1件,垂幢形玉饰1件。

东陵出土的玉器,包括六号探方出土的玉琮残件,共有20件,其中:

玉璧,4件,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,平素无纹,色泽斑斓,以淡绿色为主,带暗

注:①郑建:《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出土玉器鉴定报告》,《文物》1986年第10期。

绿和黄褐色斑纹,大的直径 23.5 厘米,厚 1—1.1 厘米;中有圆孔,孔径 4 厘米,由于两面对钻定位不准,孔内壁都有台痕和钻槽;1 件玉璧的背面,还留有直径 20.2 厘米的圆弧线切琢痕迹,系圆盘状工具加工时残留下的。

琮,3 件,近似方柱体,中有孔,内圆外方。1 件边长 1.55 厘米,高 7.6 厘米,孔径 0.55 厘米。琮体分上下 2 节,每节两面以棱为对称轴组成兽面,有直径 2.5 毫米的圆圈表示眼睛,椭圆形凸面表示眼睑,扇面形凸面表示鼻子,下部的横条表示嘴,琮体 4 面组合成 4 组连续的兽面图案,雕琢得十分精心。还有 1 件上部边长 7.25 厘米,下部边长 7.26 厘米,高 5.5 厘米的,可分 3 节,兽面纹刻凿得更为精细。

玉钺,1 件,略呈扁平梯形,二面弧凸而圆浑,中有两面对钻的大圆孔,双面弧刃,无使用痕迹,非实用器。

杖头,1 件,琢磨精细,表面光滑,有一凸棱将该器分成上下两部分。上部较宽,边角上翘,有圆形镂孔 5 个,弧形镂孔 4 个。圆形镂孔直径 3 毫米,系单面钻成,孔壁垂直;弧形镂孔系钻出圆孔后加工扩大而成。下部平滑无纹,底面有一长 2.2 厘米,宽 0.3—0.4 厘米,深 1.3 厘米的凹槽,组成手杖棒头插入的卯孔,手杖因易于腐朽而没有留下。这种有玉杖头的手杖当为权杖,持有者掌握着较高的权力。

另有玉圆片 1 件;玉纺轮 1 件;镯 2 件;环 1 件;锥形饰 5 件;珠 18 颗,坠 1 件,管 1 件,组成一组串饰。

## 二

从张陵山遗址发掘的直接意义来说,有两点最为重要。

首先,是确立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——张陵山文化,为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作了补充,并使之更加具体和精确。

通过发掘并对典型墓葬和出土文物的整理,可确定其下层文物与草鞋山中层、崧泽下层的出土遗物的基本特征相一致,张陵山遗址的第四层应视为崧泽文化期的堆积。其绝对年代,距今约有 5500—6000 年。

张陵西山上层,叠压在上述崧泽文化层之上,其相对年代明显晚于崧泽文化。这一层出土的陶器,泥质灰陶较多,胎表均呈浅灰色,器型多折肩、折腹,以弦纹和附加堆纹为常见纹饰;与典型良渚文化期以泥质黑衣陶为主,胎壁匀薄,



制作甚精,以精细的弦纹为主题纹饰不同。典型器物:鱼鳍形足鼎、翘流宽把粗矮圈足豆、贯耳壶、灰陶盆、罐,生产工具中有肩穿孔石斧、双孔石斧、石镰以及玉器中的琮、瑗等。具有既区别于崧泽文化,又区别于典型良渚文化遗物的特征,而显示出从崧泽文化向典型良渚文化过渡的特色。据此,考古界将具有这类特征的文化命名为“张陵山文化”;<sup>①</sup>也有些考古专家,则将其归入良渚文化的范畴,而称其为“早期良渚文化”或“良渚文化张陵山类型”。<sup>②</sup>

张陵山东陵第三层墓葬出土的遗物,体现了典型良渚文化的特征;其第二层遗物,则为以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青瓷器为特征的吴文化的典型遗物。<sup>③</sup>

由此看出,张陵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层,自下而上依次为崧泽文化、张陵山文化、良渚文化、吴文化。从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上明确了各种文化的相对年代,并为太湖流域原始文化序列,补充了“张陵山文化”的环节。

张陵山文化的绝对年代,据张陵山西陵上层2号探方出土的木炭标本[ZK433]碳十四测定,距今年代为5160±230年,树轮校正5785±240年,这个数据有人认为偏早些,一般认为其绝对年代上限距今约5300年,下限距今约4700年。

张陵山文化的存在和特征,及其绝对年代的考证,为后来上海、浙江诸次发掘和江苏常州寺墩及其他地区的发掘所证实。

其次,玉器的成批出土,是张陵山遗址发掘中的重要收获。以前人们历来认为琮、璧、圭、钺等玉器出现的时间较晚。清末吴大澂在《古玉图考》中收录这类玉器甚多,但他都笼统地考订为“三代之器”,也就是夏、商、周时期的遗物。解放前,浙江良渚茅庵村,荀山周围,长明桥的钟家村、金家弄,瓶窑的宋村等地,发现包含琮、璧、钺的大批玉器,<sup>④</sup>嘉兴双桥也发现大量玉璧,<sup>⑤</sup>有些玉器发现时还与良渚文化期的其他遗物同存共出。但是,人们囿于传统的看法,而“不能肯

注:①南京博物院:《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6辑,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;《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》,《文物》1986年第10期。

②南京博物院:《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》,《文物集刊》第1集。

③镇江博物馆:《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报告》,《文物》1984年第5期;邹厚本:《江苏南部土墩墓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6辑。

④施昕更:《良渚》,1938年版。

⑤卫聚贤:《吴越考古汇志》,《论文月刊》第1卷第3期。

定这些玉器是否为新石器时代遗物”。<sup>①</sup>更有人认为这些玉器“大概属于汉代文化的”。<sup>②</sup>张陵山东陵距今 4000 多年的良渚文化墓葬中,发现用 4 件玉璧、2 件玉琮、1 件玉钺、1 件玉质杖头等 19 件玉器随葬的现象;西陵距今四五千年的张陵山文化期的墓葬中,已有玉琮、玉钺等重器;在西陵下层距今五六千年的崧泽文化期的墓葬中,已有玉钺和玉镯、环、珠、坠、管等装饰品出土。这些出土玉器,地层关系清晰,断代依据充分,为纠正传统看法提供了有力的物证。张陵山玉器群,是国内迄今为止,发现的最早的玉器群之一。

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与特色。夏鼐说,世界上“别的古代文明中,除了中美洲文明之外,都没有玉器”。<sup>③</sup>中美洲的玉器也不如中国古代玉器那样丰富、精致,没有像中国那样,对玉器赋予种种神秘甚至神圣的含义。根据文献记载,我国周代就有一整套用玉的礼制,如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就有:“以玉作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;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。”张陵山文化期的墓葬,以玉琮、玉钺、玉璧等大型礼器构成神秘、庄严的特色,初步体现了太湖地区原始人类对玉器已产生深厚的宗教感情。

张陵山遗址发掘中出土数量众多的精美玉器,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琢玉技术,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。张陵山玉器,经鉴定为阳起石和透闪石,其硬度都大于 5 度。质地坚硬的玉料,要雕琢出千姿百态的图案,制作出巧夺天工的玉器来,这绝非易事。玉器制作的工艺,是人们数百万年石器制作经验的再体现,治玉是石器制作技术高度发达时的产物。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,这是《诗经》中著录的至理名言,它道出了琢玉的真谛,利用简陋的、原始的工具,加上硬度比玉更高的金刚砂、石英、柘榴石等“解玉砂”,再辅以水来实现对玉料的切削、打孔、琢磨和花纹的刻制,可谓花工、费时、耗心血。

遗址内出土的兽面纹玉琮是张陵山文化期琢玉工艺的杰作:它用减地法突出刻有兽面纹的台面,用圆圈、椭圆、弧线、横直短线组成威严生动的兽面纹饰。

注:①尹焕章:《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》,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。

②裴文中:《中国石器时代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年版。

③夏鼐:《中国文明的起源》,《文物》1985 年第 8 期。